

明清目录中“《文心雕龙》子书说”考论

梁穗雅 彭玉平

古代文学批评著作出现之初,传统目录学中并没有专门的类别予以归类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将《文心雕龙》(以下简称《文心》)、《诗品》等归入集部总集类。其后的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、《玉海》等沿用同样的分类法。直到宋代《崇文总目》等设立“文史类”,收录有关文学批评的著作,《文心》多被归入“文史”一类,此类又往往入集部。^①

有明一代,焦竑、祁承燾于集部创立“诗文评”类。从此,“诗文评”逐渐成为收录古代文学批评著作最合理的目录归类。至清代的目录学巨著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出现,“诗文评”更成为古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专称,得到普遍认同。作为古代文学批评的经典作品,《文心》被《四库》当然地收于“集部/诗文评”。明清时期大部分收录《文心》的目录都使用了这一分类法^②。但是,就在同一时期,一些私人目录里却出现了把历来归于“集部”的《文心》纳入“子部”的独特现象^③,学界对此却一直缺乏应有的关注。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,考索明清间“《文心》子书说”的来龙去脉,并尝试辨析此说的学术内涵及其对《文心》研究的意义。

诸子散文为后代散文之宗。《隋志》以来,“子亡而集代兴”之说,指的就是两汉子学衰微后,天下文章逐渐由子部汇聚到集部这种子、集间的承接关系。而且,子、集两部的交叉时有发生。子部杂家往往收录与“经、史、集”错综的作品。同时,集部之“别集”也收录

涉及政治、哲学、史学等超出文学范围的作品。^④

那么子、集区别何在?所谓“子书”,刘勰《文心·诸子》:“诸子者,入道见志之书。”萧统《文选·序》:“盖以立意为宗,不以能文为本。”今人总结为:“旧时六经以外,著书立说成一家言”者^⑤。至于“集部”,《隋志》:“文者,所以明言也。”《四库总目》:“古人不以文章名,故秦以前书无称屈原、宋玉工赋者。洎乎汉代,始有词人,迹其著作,率由追录。”今人总结为:“诗文词等书之总称。”^⑥近人吕思勉进一步区别二者:“集为一人之著述,其学术初不专于一家;子为一家之学术,其著述亦不由于一人。勉强设譬,则子如今之科学书,一书专讲一种学问;集如今之杂志,一书之中,讲各种学问之作皆有也。”^⑦要之,除“立意”与“明言”,“成一家言”与“以文章名”的差别外,是否“学有专门”也是子、集区别所在。

一、明代“《文心》子书说”的兴起与发展

据杨明照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》所录,最早把《文心雕龙》归入“子部”的目录著作是明代成化年间叶盛编写的《菴竹堂书目》。然而,早在五代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内部杂家类中,便已著录:“《刘子》十卷,刘勰撰”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、《通志·艺文略》均同此例。参照有关《刘子》作者争论可知:宋人于目录中视刘勰为“刘子”,乃出于以刘勰为《刘子》一书作者所致,与《文心》之属性无关^⑧。

至明代,开创《文心》研究的杨慎点评,明确于《文心》中称刘勰为“刘子”:“此论发自刘子,前无古人。”为现存较早直接于《文心》中称刘勰为“刘子”的文献,惜杨氏评点没有就此作进一步说明^⑨。此外,在明代《文心》序跋中,称“刘子”的还有:明初程宽的序,终篇称“刘子”;宏治间都穆的跋:“有能深于文理,折衷群言,究其指归,而不谬于圣人之道如刘子者,诚未易得。”^⑩

至明末另一位研究《文心》的大家——曹学佺评点《文心》时,这种模糊的指称已演化为明确的表述。曹氏评《诸子》篇曰:“彦和

以子自居,末《序志》内见之。”评《序志》篇曰:“彦和虽是子类,然会其大全,要之中正,所以为难。”^⑪

值得注意的是:视《文心》为子书,在唐人评论中已见端倪。刘知几的《史通·自序》从“救时弊、疾虚妄”的立言精神着眼,视刘勰为子、《文心》为子书,如《文心雕龙研究史》所言:“从扬雄、王充、应劭、刘劭、陆景到刘勰,他们担当起社会批评家的职责,以清明的头脑结撰子书,故无不具有疾虚妄的理性主义精神,刘知几表示自己与这些先辈一脉相承……”^⑫陆龟蒙则高标《文心》“岂但标八索,殆将包两仪”、“本立以致诘,驱宏来抵巇”的恢弘结构,同时指出其书“或欲开户牖,或将饰纓缕。”的性质。^⑬由藤原佐世编成于九世纪末的《日本国见在书目录》,更首次明确于书目中纳《文心》入“杂家”^⑭。从唐代中日文化的渊源,可推知唐人视《文心》为子书乃确凿之事。

然而,唐人的见解在本国却至明代才得到较广泛的响应。首先,在诸多明代序跋中,论及《文心》“成一家言”性质者,除程宽序外,还有其后的叶联芳序与万历间的伍让序。它们既继承了刘知几的论点,又进一步指出《文心》折衷群言、归于圣人之道的立言宗旨,明确其“法垂百祀”、“成一家言”的历史地位,同时尝试分析《文心》的系统结构。^⑮考明代评论、序跋,以上三种论调实乃时人开始认识《文心》价值的代表观点。虽不是都得出“成一家言”的结论,但视《文心》为子书,在明代评论、序跋中绝非奇谈怪论。

其次,现存明代刊刻的《文心》版本,也反映出明人视《文心》为子书的普遍性。现存明人刊刻的《文心》有《汉魏丛书》、《两京遗编》、《合刻五家言》、《诸子汇函》、《奇赏汇编》、《汉魏六朝别解》六个总集收录本^⑯。其中,仅后人增补的《(广)汉魏丛书》收《文心》于“载籍”。《两京遗编》、《合刻五家言》、《诸子汇函》、《汉魏六朝别解》本身就是专门收录子书的专集^⑰。其中归有光的《诸子汇函》,还以“云门子”为刘勰命名^⑱。至于明崇祯年间刊刻、陈仁锡评选的《奇赏斋古文汇编》,则著录《刘子文心雕龙》于四部之“选子”一部。陈

仁锡的同年文震孟,为归氏《诸子汇函》作序之人。从两集编录、题跋作者间的联系,也体现出“《文心》子书说”在明末学人中的传播与影响。

综上所述:起始于唐、盛于明中后期,视《文心》为子书的学界风潮,乃是明代目录收《文心》入“子部”的大背景。目录归类的变迁,更成为这一风潮兴衰的坐标。

杨氏《校注拾遗》中,最早把《文心》入子部的是编成于成化七年(1471)左右的《菴竹堂书目》。据《粤雅堂丛书》本,著录《文心》的卷三“子杂”类,所收十分庞杂^{①9}。结合有关《菴竹堂书目》版本真伪问题的争论,以及“集部别出举业类,而无诗集类”的独特分类体例^{②0},此书目以《文心》入子部有可能是后人篡改造成,也可能为编著者分类体例不纯所致,其间著录者以《文心》为子书的意识并不甚明确。

稍后出现的晁瑬《宝文堂书目》(嘉靖年间)和赵琦美《脉望堂书目》(万历年间),都不约而同地将《文心雕龙》复见于两种分类中:《宝文堂书目》除把《文心》著录于上卷“子”类外,还在卷中“类书”处著录了“《文心雕龙》旧刻一、近刻一”^{②1};《脉望堂书目》则把《文心》复见于“荒字号:集附”与“昃字号:子/杂家”,其中录于“集部”的为《杨升庵集》中所收的版本^{②2}。

就著录情况来看,较之叶盛,晁氏视《文心》为子书的意识稍见明确:《宝文堂书目》没有按四部法严格分类,而是分为34个小目。其间,诗文评作品几乎全部归入“子杂”类。可见,晁氏不仅视《文心》为子书,甚至视大部分文学批评作品为子书。至于赵氏的编目,从“荒字号”的著录情况看,极可能因此本为《杨升庵集》所收,故随《升庵集》同归于集部,导致复见。

至明末徐爌《红雨楼家藏书目》,作者视《文心》为子书的意识最为明确。徐爌,字惟起,闽县人。根据其附录的序跋、藏书铭,《红雨楼家藏书目》当始编成于万历三十年(1604),其后一直有增附,

至南明方止。其分部按经、史、子、集四分。《文心雕龙》被著录于第三卷“子部”的“子类”中,包括“《文心雕龙》十卷”和“《杨升庵批点文心雕龙》十卷”两种本。其他各类均不见有复出。^{②③}

此目除了《文心》归类单一外,最引人注目处还在于:杨明照所收七篇录自“徐[焞]批校本文心雕龙某册某卷”的序跋书信(包括《明程宽序》<此序原为徐焞抄>，《明叶联芳序》<此序原为徐焞子延寿抄>，《明乐应奎序》，《明载玺序》，《明伍让序》<此序原为徐焞抄>，《明徐焞跋》，《明曹学佺与徐焞书》。)中,由徐焞抄录的两序均为上文提到的称“刘子”、标举《文心》“成一家言”者。其子延寿所抄的叶联芳序也持相同论调。加之徐[焞]与曹学佺的交往,虽徐[焞]自己没有书目中阐述对《文心》归类的看法,但其持“《文心》子书说”却甚为明确。

综上,万历年间徐[焞]编著的《红雨楼家藏书目》，乃明代书目中以《文心》入“子部”较成熟的代表。它的出现反映出“《文心》子书说”在明末的成熟和盛行。

二、清代至今“《文心》子书说”的延续

据杨明照所录,收《文心》入“子部”的中国书目,除以上四部,还有明末清初祁理孙的《奕庆藏书楼书目》，清初金檀的《文瑞楼书目》和沈复粲的《鸣野山房书目》三家。此后,几乎所有著录《文心》者,皆同《四库》例归诸“集部/诗文评”。目录著作中以《文心》入“子”部现象到此告一段落。

明末清初《奕庆藏书楼书目》编者祁理孙世称“祁五公子”，其父祁彪佳(忠敏公)曾讲学于山阴蕺山,受业于刘宗周。其后的《鸣野山房书目》编者沈复粲为祁氏同乡,曾与同里杜氏辑《蕺山刘子全书》，自辑《刘子书补遗》，又与杜氏校刊《忠敏文集》。其学与祁氏同源,祖于王阳明,从于刘蕺山。从学术渊源以及生卒年月看^{②④}，《鸣野山房书目》收《文心》入“子之一/诸子”，极可能是受《奕庆藏

书楼书目》收《文心》入“子部子之一/诸子”影响。

祁理孙的祖父祁承爍乃明代著名的目录学家,其《澹生堂藏书目》创立“诗文评”类,把《文心》归入“集类第八/诗文评”。《庚申整书小记》里,祁承爍告诫子孙:“及吾之身则日益之,及儿辈之身则岁益之,书目每五年一为编辑。”^{②4}因此,《奕庆藏书楼书目》应为《澹生堂藏书目》重编而成。至于为何祁理孙没有继承祖父的开创,一改《文心》归类,著之于“子部/子之一/诸子”,由于不见原目,本文暂不能就此作出更确切的解释。但可推知:祁理孙必是深受“《文心》子书说”的影响方能作出如此变更。至于《鸣野山房书目》的归类,除可能受祁氏编目影响外^{②5},《文心》所入的卷三“子之一/诸子”更同时收有前文所提、视《文心》为“子书”的明代归有光《诸子汇函》、陈仁锡《诸子奇赏》两子集。^{②6}据此,沈氏编目“《文心》子书说”的源流清晰可辨。

清初的《文瑞楼书目》继承了明代徐氏编目的明确性。和《红雨楼家藏书目》一样,《文瑞楼书目》除以《文心》入子部外,还在集部设有“诗话”一类,专收诗话作品。可见两位编者认为:《文心》与普通诗话间有着质的区别。《文瑞楼书目》更进一步,将《文选》、《文章正宗》等总集都归入子部之“古文”类。^{②7}在金檀看来,《文选》、《文心》都可视作子书,只有诗话为“集部”作品。

金檀的分类,在清代中期遭到目录学家周中孚的严厉批评。《郑堂读书记》于《文瑞楼书目》一条曰:“然如子类中以《文心雕龙》、《艺圃琳琅》二种为子书……则几不能数马足,乌能别其牝牡骊黄乎?”^{②8}光绪年间,缪荃孙重编徐爌《红雨楼题跋》时,更将徐氏的《文心》跋,全部重新归入“集部”。至此时,各家目录已普遍把《文心》入“集部/诗文评”。可见:清中后期在目录中将《文心》入子部已为时流所不能接受。

然而,同在光绪年间,却出现了继明代序跋以来最为明确阐述“《文心》子书说”的评论——

谭献《复堂日记》:“彦和著书,自成一子,上篇廿五,昭晰群言;下篇廿五,发挥众妙。并世则诗品让能,后来则史通失雋。文苑之学,寡二少双。立言宏旨,在于述圣宗经,所以群言就治,众妙朝宗者也。”《文心》“可谓独照之匠,自成一家。章实斋推究六艺之原,未始不由此而悟。”²⁹

除继承前人,更加明确《文心》的崇高地位、恢弘结构外,谭献还从宗经溯源的角度,将刘勰的开创与章学诚的“校讎学”联系起来。章学诚对《文心雕龙》的评价,被后世引为经典:

《诗品》之于论诗,视《文心雕龙》之于论文,皆专门名家,勒为成书之初祖也。……此意非后世诗话家流所能喻也。……《诗品》《文心》,专门著述,自非学富才优,为之不易,故降而为诗话……³⁰

三、略辨“《文心》子书说”之价值

上文回顾了“《文心》子书说”产生、发展以及式微的概况。此说价值何在?今日重提对《文心》的研究有何意义?

首先,从历史价值看,繁荣于《文心》研究第一个高峰期——明末清初的“子书说”,在加深学人对《文心》理解的同时,还提高了它的学术地位。从此《文心》区别于一般诗文评受到重视。

经史子集,子在集前,诗文评居集部最末。从“集”之“诗文评”到“子部”,地位的提高显而易见。且子部重其“意”,集部重其“文”。视杨明照所录隋唐宋的《文心》品评,除具“子书说”观几家外,仅从文采、四声、品评文章、议论文病的角度评价《文心》。元人钱惟善序,始从儒家立场出发,辨析《文心》“其旨不谬于圣人,要皆有所折衷,莫非六经之绪余尔”的“立言著书”意识。入明后,《文心》“出入六经、贯穿百氏”之“意”终以“子书说”的形式得到学界的确认。至于“《文心》子书说”在万历间掀起的《文心》研究热潮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,可从曹学佺、徐爌等当时校勘、注释、研究《文心》的大家

均持“子书说”一点得到验证。

明以前论《文心》，或并举沈约，或并举《史通》。举沈约重其声律之论，举《史通》重其“讥弹古人，大中文病”^③。此时，《文心》与其他诗文评并无别致。明代胡应麟以《文心》之“兼该体要”、《诗品》之“历遡渊源”、《文选》之“镕鉴古今”标举三者“博于集者”的性质。而明代“《文心》子书说”恰是时人对《文心》“博于集”性质的明确定位。自此《文心》研究逐渐超越诗文评其他作品，独树一帜。至清章学诚：“诗品之于论诗，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，皆专门名家，勒为成书之初祖也。”^④《文心》在古代文学批评中“体大虑周、笼罩群言”、“非后世诗话家流所能喻也”的崇高地位终于确立^⑤。

其次，从研究价值看，对“《文心》子书说”的深入探讨，有利于今日研究者回到历史的真实来看待《文心》一书的立意、结构和价值。

四部中经、子最古，集最后出现。“集”的诞生时间恰在刘勰著《文心》之魏晋南北朝。就当时而言，刘勰参考“皆成一家言”两汉子书的立言宗旨、著述体例作《文心》的可能性极大。这方面刘永济、王运熙等已作初步阐发，惜无深入探讨的后来者。

试以“子”的精神解《文心》之“道”，则《诸子》篇中范文澜指出的“矛盾”：“《原道》里说：‘道沿圣以垂文，圣因文而明道。’‘人文之元，肇自太极’，是通过庖牺、仲尼来认识的。这里却说：‘鬻熊知道，而文王咨询’，‘伯阳识礼，而仲尼访问。’那么不光是圣人认识道，诸子也认识道，圣人也通过诸子来认识道了。”^⑥实与扬雄、王充等两汉诸子一脉相承。

汉代强调“述而不作”、尊经术的同时，士人“成一家之言”的述作意识不断加强。面对“述而不作”的强大传统，司马迁、扬雄、桓谭、王充等往往于著述中为自己的“著书立言”作一番“不谬于圣人”、“其事则述，其书则作”的自我辩白^⑦。倡言“征圣、尊经”的刘勰，自然也必须为自己的“著书立说”作一番“惟文章之用，实经典

枝条”、“术道言治,枝条六经。其纯粹者入矩,踳驳者出规。”的辩白。这种自辩,与“文以载道,明其当然;文源于道,明其本然”^③时推崇孔圣、六经的决然,以及自舒怀抱、明“成家立言”决心时的坦然不可同等视之。^④对这一矛盾的深入解读,将为理解刘勰的“道”中儒家与百氏的关系,提供一条更清晰的线索。

刘勰写作《文心》有着明确的系统构造意识,此几为学界共识。至于子书的系统性,以及编目排列类聚区分、篇与篇之间的联系等等与《文心》系统结构的关系,王运熙曾略有提及,甚至举出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新语》、《淮南子》为例对比^⑤。当今龙学研究中,也有对比《文心》与子书的尝试^⑥,但与其他比较研究相比,因缺乏鲜明的旗帜,一直成果寥寥。对《文心》子书性质的确认,将为这类研究提供更广阔的空间。

《文心》系统性与后世“诗文评”从立意到体例的差异,前人早已论及。追溯差异的根源,牵涉到“中国古代文论为何只有一部‘体大虑周’的《文心雕龙》?”的解答。如果将《文心》放入“子书”系列,对比“体兼说部”的诗话词话,其间与“诸子书”、“说部”间学术体貌差异及联系的关系,更值得深入探析。章学诚曰:“两汉文章渐富,为著作之始衰。”^⑦这句话或许还可用来解释“论文专著”《文心》之空前绝后。

以上种种研究推想,皆依赖于对“《文心》子书说”的重新整理和深入探讨。

注:

①据杨明照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》附录《著录第一》:收录《文心》的宋元目录共13家。其中,以《文心》入“文史”类的宋元目录有8家:宋欧阳修、宋祁等的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、南宋的《宋四库阙书目》、宋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、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题解》、元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、元脱脱《宋史·艺文志》中的“文史”一类,均属于“集部”下的分类;据现代出版社1987年版《中国历代书目丛刊》,宋王尧臣等的《崇文总目》中“文史”乃与“总集、别集”同归于卷五;而宋郑樵的

《通志·艺文略》里,“文史”属于“文类第十二”。其余5家:宋晁公武《衢州本郡斋读书志》以《文心》入“集类”之“文说类”;唐魏征等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后晋刘煦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、宋王应麟《玉海》以《文心》入总集类;宋晁公武《袁州本郡斋读书志》以《文心》入“别集类”。第416~431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2年。

②③据杨明照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》附录《著录第一》:收录《文心》的明清至近代35家目录中,有16家人“诗文评”类,1家人“诗一格评”。第416~431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2年。

④高明路:《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》,第七章《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。

⑤《辞源》“子书”条,商务印书馆,1988年合定本,420页。

⑥《辞源》“集部”条,同上,第1800页。

⑦吕思勉:《经子解题》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1995年版,第88页。

⑧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于子部杂家类“《刘子》十卷”条,归纳了唐宋间关于《刘子》一书作者归属的争论。

⑨周振甫注《文心雕龙注释》,《风骨第二十八》之“杨评”条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,第322页。由于周振甫对所录的杨、曹、黄、纪四家评本,“评语有涉及注释的,注中已详,从略”,本文仅就所见各条进行总结。

⑩杨明照: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,第727页、745页。

⑪张少康、汪春泓、陈允锋、陶礼天《文心雕龙研究史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,第81页。

⑫同上,第9页。

⑬杨明照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》,第433~434页。

⑭《日本国见在书目录》“杂家”一类收“《文心雕龙十》、刘勰撰”,“总集家”一类又收“《文心雕龙十》、刘勰、在杂家”。据《丛书集成初编》,中华书局1985年版。

⑮见杨明照: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》附录“序跋第七”,第727~728页、第729页、第745页。

⑯詹锜:《〈文心雕龙〉版本叙录》,见《中华文史论丛》第三辑,中华书局1980年版。

⑰天启年间归有光编的《诸子汇函》和明末钟惺辑评的《合刻五家言》,被

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的《中国丛书综录》编入“子类”。万历年间胡维新辑刊的《两京遗编》，收两汉魏晋间十一部子书，《序》称《文心》：“其人非汉也，其文汉也”。《四库全书》收《汉魏别解》于子部/杂家类存目十一。

⑮归有光《诸子汇函》，见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，第126册，齐鲁书社1997年版。

⑯《菴竹堂书目》，见《明代书目题跋丛刊》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。

⑰申畅：《中国目录学家传略》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版，第66—69页。

⑱《晁氏宝文堂书目/徐氏红雨楼书目》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，第86页。

⑳赵琦美：《脉望堂书目》，见《明代书目题跋丛刊》，“千墨庵主人手写本”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。关于两目收录《文心》于两类的问题，杨明照《校注拾遗》无提及。

㉑《晁氏宝文堂书目/徐氏红雨楼书目》，第289页。

㉒祁承燦：《澹生堂藏书目》，见《明代书目题跋丛刊》，同上。

㉓从祁理孙与沈复粲的学术渊源及生卒年月推断：祁理孙卒于康熙壬寅年(1662)后几年，沈复粲生于1778年，卒于1850年。

㉔沈复粲：《鸣野山房书目》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，第37页。

㉕金檀：《文瑞楼藏书目录》，见《丛书集成初编》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。

㉖周中孚：《郑堂读书记》，卷三十二，史部十八，目录类一，见刘承干辑《吴兴丛书》，1929年版，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。

㉗杨明照：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》，第447页。

㉘章学诚著、叶瑛校注：《文史通义校注》，中华书局1994年版，第559—560页。

㉙杨明照：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》附录《品评第二》，《宋黄庭坚》条，第434页。

㉚章学诚著、叶瑛校注：《文史通义校注》，中华书局1994年版，第559—560页。

㉛同上。

㉜范文澜：《文心雕龙注》，第196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78年。

㉝于迎春：《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》，第三章《述作意识与文史哲的分离》，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。

㉞纪昀点评《原道》篇语，见范文澜《文心雕龙注》。

㉟见刘勰《文心雕龙》之《序志》、《诸子》、《原道》篇，见范文澜《文心雕龙注》。

《太平广记》在南宋流传的三则记载

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二十七中有如下一条资料:

才卿问:“秦汉以下,无一人知讲学明理,所以无善治。”曰:“然。”因泛论历代以及本朝太宗真宗之朝,可以有为而不为。太宗每日看《太平广记》数卷,若能推此心去讲学,那里得来!不过写字作诗,君臣之间以此度日而已。……

朱熹批评宋太宗每日看《太平广记》,耽误讲学明理。

大诗人陆游也爱读《太平广记》,在《老学庵笔记》卷十记道:

陈师锡家享议,谓冬至前一日为“冬住”,与岁除夜为对,盖闽音也。予读《太平广记》三百四十卷有《卢项传》云:“是夕,冬至除夜。”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,亦谓之除夜。《诗·唐风》“日月其除”。除音直虑反。则所谓“冬住”。

赵与时《宾退录》卷八载:

《太平广记》载宣州司户死而复生,云见城隍神,自言晋桓彝也,与所传不同。然彝今亦别庙食于泾。绍兴辛未,潼川守沈该将新城隍祠,梦人赉文书来,称新差土地,阅其姓名盖史坚,序事愈涉怪。淳熙间,李异守龙舒,有德于民,去郡而卒,邦人遂相传为城隍神矣。尤浅妄不经也。唐羊士谔有《城隍庙赛雨绝句》二首

赵与时是南宋末人,这时的《太平广记》几乎已经是家喻户晓了。

(姜光斗)

③⑧王运熙《文心雕龙探索》,第41~42页。

③⑨《文心雕龙学综览》之《〈文心雕龙〉研究论著目录索引》录黄孟驹《王充〈论衡〉与〈文心雕龙〉》,上海书店1995年版。《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目录索引(1978~1999)》录马白《〈淮南子〉与〈文心〉》、刘文忠《〈荀子〉对〈文心雕龙〉的影响》、陈良运《〈文心雕龙〉与〈淮南子〉》等。

④⑩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之《文集篇》,第296页。